

仓衷)

(摘自《中华民国史料丛稿》的《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标题为原编者所加。)

“东方的劳伦斯”——土肥原贤二

杨照远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这个曾在中国大肆活动20余年的日本特务头子，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从张作霖被炸、“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阴谋建立华北各伪政权、到南京汪伪政权的出笼等等，无一离不开他的阴谋与策划。太平洋战争中，他又充当了东南亚的霸主。他的足迹到达哪里，灾难就降临到哪里，他的名字竟成了灾难和恐怖的代名词。所以，西方人称他为“劳伦斯”，东方人称他为“土匪源”。

土肥原特务身份的由来

土肥原贤二，1891年8月8日出生在日本冈山县。其父土肥原良永，日本陆军少佐。其兄土肥原鉴，日本陆军少将。土肥原贤二，14岁入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后转入东京陆军幼年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1904年，他做为“陆士第十六期毕业生”，受步兵少尉衔。后又被选送日本陆军大校深造，1912年毕业于。任职于日本参谋本部，不久，即被派往日本驻中国最大的特务机关之一——坂西公馆，(地址在北京锡拉胡同)任坂西利八郎中中将的辅佐官。开始了他20余年在中国的的职业特务的生涯。

土肥原贤二，在坂西公馆5年，在齐齐哈尔任黑龙江督军军事指导官2年。7年中，对中国历史及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思想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又经过特殊训练，他精通了汉语。在与中国各级军阀的交往中，逐步积累、掌握了拢络人心的能事和吸引汉奸人物的手段，成了“北京型的中国通”。

土肥原职业特务的能量与具体表现，获得了老牌特务头子坂西利八郎的信任和赏识。经坂西的推荐，土肥原贤二不久便充任了隶属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并兼握有对热河省、通州、唐山等地特务机关的全部指挥权。”从此，他做为坂西的入赘女婿，“真正继承了青木到坂西的精神遗产”，阴谋策划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大事件。

土肥原贤二与“九·一八”事变

1928年6月4日清晨5时半，距沈阳仅一公里皇姑屯车站震天动地的爆炸，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贵宾车和客车3节车厢被炸翻，张作霖身负重伤，4小时后毙命。这场由日本关东军及其特务一手制造，被日本政府一直保密的“满洲某重大事件”——“皇姑屯事件”，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借通过铲除张作霖的混乱局面，以“维持满洲全境治安”的名义，出动军队占领全东北，建立所谓“独立”的傀儡政权的一次预演。前台人物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和日本守备队的东宫铁男。而在他们的后面便是日本参谋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深知此情，暗祝这一计划成功”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就是策划“皇姑屯事件”主谋者之一。

从1929年开始，日本军部按照“东方会议”的方针，进一步策划、制订了侵占中国东北及侵占后的统治方案。1931年6月中旬，日本政府指派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

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雄、欧美课长渡久雄和中国课长重藤千秋为委员，制订了“以实力解决满洲的策略”。

为实现“以寡制众”、分散中国东北军的实力，土肥原亲自出马，用飞机把在大连的山西军阀阎锡山送回太原，出兵华北，牵制东北军。土肥原还唆使军阀石友三参加反对张学良的联合军事行动。然后，土肥原又策划了延边、哈尔滨的暴乱，鼓励蒙古独立，以配合日本关东军突然发起事变。

土肥原积极策划和制造引起战争的借口。1931年9月，他直接插手“中村大尉事件”的调查后，即赴东京汇报了“中国军队的实力、训练、令通、通讯设备及民众情况”，并建议“以中村事件为借口”，作“采取军事行动的紧急措施的准备。”

日本政府采纳了土肥原“关于满洲一切悬案应尽量从速解决，如有必要，应以武力解决的主张”，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后，把“一贯主张将满洲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派往沈阳。

当身着便装的建川出现在沈阳的当天，一场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便爆发了。

土肥原与伪满洲国的炮制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北后，便采取了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等三个步骤。土肥原抱着把中国东北直接变为“日本领土”的野心，首先对张作霖旧部“剩余的军阀、官吏施以手段”，为拼凑傀儡政权作准备。1931年9月20日，土肥原派遣制造皇姑屯事件的重要角色、柳条湖事件的中心人物——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少佐（后任牡丹江省省长）赴处于被日军软禁的、前奉天省长臧式毅家中谈判，完成了臧式毅出面为日本

占领者效劳的任务。

9月21日，土肥原直接充任伪奉天市长，对张学良东北军旧部和人民群众施以法西斯高压政策。

9月22日，即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片仓衷等人，在沈阳旅馆一号室，参加了以关东军参谋三宅光治名义召开的“收拾满洲局面的”“重要会议”，在“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的激烈争论中”，土肥原按照日本政府“远在事变前，即已产生迎接溥清逊帝宣统皇帝为新满洲政权首脑”，这“早已确定的既定方针”，在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的主张。于是一个“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土，以宣统皇帝为首建立中国政权”，并包括这个“政权”的“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由日本管理，“在国防和外交方面所需经费，由新政权负担”，并要利用东北各地亲日军阀，拼凑傀儡的“关字第411号《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便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直接策划下出笼了。

1931年10月15日，土肥原辞去奉天市长职务，担负了“以特殊手段策划溥仪逃往满洲的工作”的“重大任务。”

10月17日，关东军司令部即收到了土肥原由天津发来的“溥仪确有逃往满洲之意，拟在吉林成立政府亦大体属实，惟天津总领事桑岛根据外务省训令，不希望溥仪外逃（外务省认为溥仪外逃条件尚未成熟），正严密监视其行动。因之，如不采取特殊手段，实难达到目的”的报密电报。

11月3日夜，土肥原赴天津日租界宫岛街静园，与幻想“龙归故里”、“到祖宗发祥地”、“重登宝座”的溥仪举行秘密会见和谈判。土肥原“根据多年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牢牢地抓住了溥仪的内心需要，“搬出了一幅赌桌上的能事”，“爽快”地答应了溥仪的全部要求。土肥原耍弄欺骗手段，致使溥仪很

快地钻进了他设下的圈套，达成了“出逃满洲”的协议。

11月8日，土肥原采取了他所惯用的“在中国某一地区，使土匪或密探惹起骚乱，则中国军队必往弹压，使骚乱危及日本侨民时，则出动日军予以镇压”的基本手法，指使他在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时的部下潘燕七和李际春等人搞起天津暴乱。

11月9日，土肥原向关东军司令官发出了“天津暴乱实为溥仪出走的一幕”的密电。

11月10日夜，骚乱中日本特务工藤铁三郎、宫岛大、上角利一等人挟持溥仪趁黑夜由英租界码头搭乘汽艇顺白河直下，途中不顾停航信号及排枪射击，冲向渤海，转乘停泊在海上的日本淡路丸号商船，全速驶向营口港。

淡路丸号于10日上午8时半抵达营口满铁码头。土肥原一面派日本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内藤雅男（甘粕正彦的化名）秘密迎接溥仪等人，赴汤岗子休息二三日，然后去已准备好的旅顺肃亲王府落脚暂居；一面以关东军的名义，向关东厅、满铁、领事馆、所属部队、宪兵队等发出通知：“溥仪因天津发生暴动，深感自身危险，为寻求安居之地，主动由天津出走。11月13日午前10时突然在营口登陆，要求我方保护。但鉴于当今时局，正采取禁止政治活动并切断与外部的交通等措施，确切予以保护。以上虽然对任何内外人士毫无顾忌之处，但在当时满洲政治形势下，溥仪的行动不仅在帝国对外关系上具有微妙之处，且为彻底保护其安全的需要，在适当时机到来之前，关于溥仪的行动严禁发表任何报道消息”。

土肥原按关东军司令官旨意等待时机，以便让溥仪充当日本在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

从上述看出，土肥原不仅在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炮制傀儡政权方面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是扶持溥仪

的决策者之一和执行者。

溥仪虽被挟到东北，但伪满傀儡政权出笼的条件尚未成熟，黑龙江省政局的变化，构成对日本侵略者的威胁。1931年11月1日，由原吉林省政府委员诚允为首与吉林、黑龙江省爱国武装力量代表在宾县组成吉林省临时政府，与熙洽汉奸政权相对抗。哈尔滨群众反日情绪日趋高涨，马占山部队又在准备抗日。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虽然早已投降日寇，但因武装力量甚小，暂时还不敢公开宣告“独立”。在这种形势下，土肥原于1932年1月16日，收到了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关于东北军旧部丁超、李杜部要进攻哈尔滨”的情报。鉴于形势紧急，关东军司令官当天宣布土肥原担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他在松井石根大佐（后升为大将）协助下，配合多门第二师团，在民族败类张景惠等人的出卖下，日寇占据了哈尔滨和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土肥原任用了一批日本顾问，充填于哈尔滨市各机关，控制实权，任意横行，成了哈尔滨的“土皇帝”。

由于土肥原对日本侵华炮制傀儡政权有功，1932年4月晋升为少将，并被任命为广岛步兵第九旅团长。

土肥原与华北各伪政权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亲日派签定《塘沽协定》，在专心培育、加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同时，为大举侵略中国内地积极进行准备。

同年10月，土肥原再次接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并把恐怖、阴谋之手伸向察哈尔、绥远，企图通过所谓“内蒙工作”，分化离间抗日武装力量蓄谋建立“内蒙自治政府”，加强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谍报工作，巩固日本在华的反苏反共的基地。然后竭力插手华北，策划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地方军阀不

抵抗日本侵略行动，拉拢冀东殷汝耕反对中央政府。

1935年6月27日，土肥原与宋哲元部下秦德纯签订了“解散排日机构”、“必须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对日满经济发展和交通开发工作予以协助”、“必须对日本的旅行予以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从日本招聘军事及政治顾问”、“必须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备（如机场设备和无线电台的设置等）”为内容的《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即“察哈尔协定”。

1935年10月12日，土肥原和土肥原机关进入北京。在此时他又策划建立了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彻底亲日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1936年3月，土肥原奉召返回日本东京，担任了日本留守第一师团中将师团长。

1937年3月，日本天皇钦命土肥原为日本宇东宫第十四师团长，率军从日本大阪出发，8月20日，在天津塘沽登陆，日寇铁蹄践踏永定河、拒马河、大清河，侵占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大名、安阳、新乡、彰德等地，对中国人民进行屠杀和掠夺。土肥原兵团和土肥原还是造成黄河决口灾难的元凶。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内地军事侵略势态不断扩大的同时，加紧策划拼凑伪政权。6月，日本政府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由陆军派出土肥原中将，海军派出津田静枝中将，外务省派出陆军退伍将官坂西利八郎中将为外务省顾问，由土肥原负责，在上海建立了“重光堂土肥原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将1937年以来成立的以王克敏为首的“华北临时政府”，1938年3月以梁鸿志为头目的“维新政府”和蒙古德王的“蒙疆自治政府”，也包括后来的汪伪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拼凑成一个“统辖这三个政府所谓中央政府。”

土肥原拟物色老牌军阀吴佩孚为中央傀儡政权的头目，命令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少将，由汉奸张燕卿协助，开展对吴佩孚的工作。今井武夫大佐负责汪精卫“脱离重庆的工作”。

这项重大阴谋，由于汪吴重重矛盾和吴佩孚患败血症暴卒，而未得逞。

1939年2月，土肥原被任为北满第五军司令官，主谋反苏活动。

1940年3月，土肥原担任了日本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士官学校校长。

1941年4月，土肥原获得了超越他前辈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的“荣誉”，被日本天皇钦授以日本大将军衔。

土肥原与东南亚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进入到第4个年头，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在新几内亚至菲律宾之线与美军进行一次大决战，以挽救愈益险恶的败局。

1944年3月22日，日本天皇钦命土肥原为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统辖日本驻马来西亚的第二十九军、驻苏门达腊第二十五军、驻爪哇第十六军及驻婆罗洲的日本守备队，担当了确保安达曼、尼科巴群岛、苏门达腊至爪哇之线，防御盟军由印度洋方向对日军进攻的任务。土肥原一跃竟成了东南亚名副其实的霸主。惯于玩弄权术的土肥原贤二，基于侵略中国的经验，在东南亚实行了法西斯高压统治，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残酷的压榨，大搞以摧残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殖民统治，给东南亚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民族灾难。人们只要听到土肥原的名字，“就恐惧得面色发白，儿童也不敢出声”，大有谈虎变色之感。所以东南亚人民称他为“土匪源”。

土肥原的下场

1944年6、7、8月份，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欧洲战场，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强行登陆，德国法西斯即将全线崩溃。亚洲战场，中国转入反攻，太平洋方面从6月开始，塞班岛、关岛、特尼安岛等相继失守。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绝对国防线”遂即崩溃。

已转任日本教育总监的土肥原，在东部司令官中静壹大将自杀身亡后，替任了中静壹的职务。9月12日，日本第一总司令官杉山元帅也自杀身亡，遗缺由土肥原递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停战，战争罪犯土肥原贤二被美军逮捕，拘留日本横滨刑事所。

1946年，东京审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被告席排成两行，坐在下面靠角落尽端（记者席正前方）的被告土肥原贤二，从面颊的凹处不时现出神经质的抽动，担心地凝视着审理的动向。每当替自己作证的证人受到愧检察官的厉声质讯时，土肥原的两只太耳就不断地抽动，并将视线转向检察官方面。精通华语、身着合体华服，俨如达官贵人般的土肥原，头部大半光秃，鼻下浓浓的短须已经变白……，这一切，只不过留给人们以过往云烟之感而已。”

1948年11月，土肥原贤二终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之”等等罪行，同板垣征四郎等其他5名甲级战争罪犯一起，在巢鸭监狱被处以绞刑，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摘自《伪皇宫陈列馆年鉴》，1985年。）